

诗性空间与体验危机

吴青科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文艺的审美表现力某种意义上需要依靠诗性空间来实现。诗性空间对于文艺创作实践、审美意识形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得到重视和挖掘。诗性空间本身的丰富内涵及其与文本特征、主观体验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更为细致而深刻地理解和阐述。随着审美观念的变化,诗性空间的功能意义及其审美体验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普遍现象,呈现出更为隐晦、病态的蜕变危机,从而从本质上深刻影响了当下文艺作品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诗性空间;体验危机;特征;功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114(2015)02-0085-07

某种意义上,由行为、特征、场景等构成的文本细节就其本身而言并无特别寓意,但若从主观创作角度或客观文本进行考察,往往能从中体验到特殊而神秘的审美内涵,以有别于主观性的依托文本传递审美意味的方式呈现出独立的审美的“诗性空间”。从生成的角度来看“诗性空间”可大致分为如下代表性的几类。一类是单纯的动作、特征,表现为时间短暂、动作单一等,如无意间的一瞥、静止的观望、一颗痣、某方面生理缺陷等;一类是封闭而隐秘的空间、行为等,如厕所、幽暗的车库、浴室、自杀等;一类是持续性的单纯行为,如无端地凝视、赏花落泪等。

关于文艺的“诗性空间”的描述、讨论在作品中以及批评性文章中倒不陌生,但对其本身所具有的文本审美意义生成功能、情感体验功能、其他学类的引申功能的详细论述就比较少了,尤其是集中针对“诗性空间”的封闭式的意义阐释以及基于此而进行的发散性的意义发掘,本论文的写作意义即在于对之进行探索性的尝试分析。

一、“诗性空间”的特征、功能分析

“诗性空间”就其属性而言虽然只是单纯的物性,它在文艺创作过程中到底有着何种功能?这种功能又是以何种具体方式发挥作用的?这两个问题理应成为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但是,正如文艺自身具有不确定的特征,相关讨论往往是以带有主观性的唯心主义式的阐述一样——很多时候即便显得十分客观而理性,但终究并未逃逸出人类的主观意识的范围——对于“诗性空间”的阐释与分析同样如此,将直接与文艺创作的直觉性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思维在其本质上又是先验性的、自由的,是难以凭靠科学的理性分析所能够完成的,甚至其本身就是文艺创作的有机构成部分。“自由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因此在经验领域内无法找到自由。”^{〔1〕(P68)}

基于其自身功能的考量,首先它在文艺创作中具有情节的开拓、意义的升华等功能。若以第一类的单纯的动作、特征进行分析,《红楼梦》第一回中有关贾雨村与甄家丫鬟娇杏偶然一顾的情景描述堪称典型。

〔收稿日期〕2014-04-30

〔作者简介〕吴青科(1987-),河南省民权县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助教。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那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2](P10)}这两个地位、身份卑贱之人无意之间于时间罅隙里碰面的情景,恐怕很少会引起读者过多的留意,但在情节的诗意和审美上却算得上《红楼梦》中极为精彩的瞬间。尽管后来随着贾雨村金榜题名将娇杏丫鬟风风光光地迎娶走,一年半载后娇杏不仅生了儿子,又碰上贾雨村嫡妻染疾病逝,被扶侧为正成了正室夫人这一后续情节的发展,诗意和审美无形中被重新带到世俗的一面而终结。

在描述贾雨村与娇杏无意间偶遇这一情景上,文本无意识地启动了“诗性空间”的全部功能。能够为这样一种结论作出有力辅证的便是这一简单情景发生时的审美机理分析,通过这一分析可隐约见出传统文学对后来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强大的启迪作用。首先,两人相遇的情景在客观方面具备了这几个特征:一是时空上的完全独立性。本来在此之前情节与之并无关系,只是甄士隐与贾雨村两人在斋房里品茗交谈而已,然而,随着家人飞报一声严老爷来拜,甄士隐随即起身离去,将贾雨村独自留在了斋房里翻书解闷,随着女子的咳嗽声,他的整个注意力瞬间转移到窗外——“窗”作为一种隔景通风的工具,在文学作品中更多地是一种审美道具,通过其狭小的洞口进一步将时空予以割裂、转移,既为人物提供了交往的渠道同时又确保了交往的隐秘性和安全性,随之整个诗意和审美的重心随之转移至狭小洞口之外的显得陌生而神秘的世界中去了。这一效果在本质上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将情景的叙述推向一种梦境的理想化的诗意状态——依托“窗”这一道具达到极致审美的另一个典型即是森欧外小说《雁》中关于主人公冈田与小玉的描述。随着描述的笔端从贾雨村平移至丫鬟娇杏,从而生成了关于情景描述的第二个隐喻性的特征。即脱离世俗观念局限的平等、自由的审美境界,也可以说是审美的纯粹性。具体而言,一方面身为地位卑微的边角角色的娇杏不仅在封闭、独立、自由的时空罅隙里彻底获得了表达自我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她那正从事的撷花的行为完完全全赋予了她的灵魂短暂性的自由与优美,可以说这一情节很大一部分功劳要算在丫鬟娇杏的身上,尽管这只是作者本人的虚构,但在写作动机的考察上也足以说明此时此刻是在营造一个短暂的“世外桃源”式的理想化的审美境界,这正是文艺的力量和意义所在。“最广义的‘情节’也可以包括情绪在人心中的运动”^{[3](P239)}此外,仅就这一情景的虚构本身也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审美意识特征之外的其他东西,如果通过对比则更容易达到这一目的。从文本的客观描述可以获知,丫鬟娇杏虽然在从事撷花的行为,但这一行为所带来的美感很快随着她对贾雨村的功利性评价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再次坠入到世俗观念之中。也可从中看出丫鬟娇杏绝非如那撷花行为一般的优美而无功利,这一点可以从她对贾雨村的评价隐约看出。“虽是贫窘,然生得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怪道又说必非久困之人”。^{[2](P10-11)}随着贾雨村对她产生了欲望之情,至此,“诗性空间”的功能基本丧失殆尽。可以将这种中国传统文学的带有浓郁的“雅俗共赏”的审美特征与日本早期的“物哀”文学进行对比,或许从中可以发现日本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借鉴和扬弃,所借鉴的更多是“雅”的部分——注重“诗性空间”的构建,所弃的也多是“俗”的部分。

事实上,文艺创作的动机很多时候并非来自作者周全细密的预先筹备,而是由偶然的不经意的诗性空间来点亮,且充满审美体验的矛盾与张力。在文艺作品中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按照第一个分类,单纯的特征同样可以充实为所谓的“诗性空间”,如芥川龙之介笔下的禅智内供的“鼻子”、平吉的“假面”、森权之进身上的“虱子”、俊吉家中的“鸡”等等,这些看似单纯无关的客观事物却无疑成为作者构思的焦点所在,笔下的全部情节无一不是围绕着因这些事物所纠缠而生的种种情思。因此,若再进一步以发散性思维想下去,甚至可以基于以上观念某种程度上触及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所在——此处所谓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并非明确界定的文艺思潮,而是所有文学作品中的相关题材或单个因子。如《诗经》中不乏如“鸡”、“鼠”、“瓜”等本身并无任何美感的琐碎事物——这些事物与“风”、“雪”、“桃”等本身带有美感的事物还是存在有明显的区别的——此类真实存在的客观事物实质性地承载了所谓的文艺思潮的真正生命力——其自身象征着文艺与现实生活真实性的密切关联。文艺思潮尽管会随着社会现实的变更、审美意识形态的蜕变而出现大规模更替的现象,但其中所蕴含的这些琐碎的题材和因子却并未随之彻底湮灭,反而潜移默化间成为新的题材的构建因素,并赋予文艺思潮崭新的审美享受,构筑并承载

其真正的生命力。如果脱离了这些题材和因子,恐怕整个文艺思潮的宏大构成难免会变得空无一物而轰然倒塌。从此意义上讲,恐怕不止文学作品、文学体裁面临结构的危险,文艺思潮同样可能被解构。

那么,为何单纯的“诗性空间”会成为文艺作品审美的核心构成,并凝聚着作者情感、情思的全部能量?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对作者以及读者的作用力是直接导向于文艺的原始目的,即苦闷的发泄。无论哪一个层级的“诗性空间”都难免会与作者内心苦闷的感受密切相关,这种关联性在具体的表现上呈现出如下的特征:一是“顾影自怜”式的意象塑造,其中同时包含有“移情”的发生,如在主观因素的作用下,将作品中的意象塑造成为孤立、单薄、平凡或者带有缺陷的事物——此类意象在物性上的共同特征即普遍显得不起眼、卑贱、轻易被忽略等;另外一种则截然相反,不再遵循“顾影自怜”式的自我观照模式,而是采取空间的理想化营造,此种空间的营造呈现出封闭、诗意、梦幻的特征,具有理想性和排斥性,且空间内的人物言行、描情状物在发生作用的途径上具有明显的隐秘性,表现为空间的幽暗、狭小、抽象等特征。因此,发生的场合大都为后花园、走廊、窗台等,也只有在此类场合中,人物言行、描情状物才能更好地按照作者的意图自由地发生,并因此而达到宣泄苦闷的目的。以贾雨村和丫鬟娇杏为例,两人也只不过是“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形下通过窗台偶然地彼此瞥上一眼,但其中所饱含的意蕴却是极为丰富且美妙的,甚至可以说隐含了作者主观性的瞬间参与。又如《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在菜园里的向日葵丛中偷情的描述,当阿克西妮亚不顾一切地陷入对葛利高里的爱情却被其不屑一顾时,她对之忍不住抱怨时却又表现出本能的害怕葛利高里生气的担忧,“她用哆嗦着的手扣好纽扣,惊惶地——他是不是生气啦——朝扭过身去的葛利高里瞟了一眼。”^[4](P82)]这一情节描写同样可以作为“诗性空间”的典型案列,客观上这一情节的全部审美能量仅仅集中在充满震撼力的极为矛盾的最后一句话而已。

“诗性空间”与创作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非是单纯的一方作用于另一方的关系,而是彼此之间时刻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诗性空间”源于创作主体基于潜意识的虚构和营造——这种行为往往是非刻意人为的,具有先验性和原始性——在宏大磅礴的故事建构中作为“精彩的瞬间”以一种平淡的方式渐入其中,为创作主体在故事建构体中提供真实而隐秘的栖息场所。因此,在对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地品鉴时,客观上需要鉴赏者凭借自身的艺术修养敏锐地意识并察觉到此类栖息场所,并为之投注巨大的情思和精力来完成鉴赏活动。同时,这种涉及鉴赏者、文艺作品、创作主体的审美活动在本质上并不受限于现实社会、文化背景等的影响,文艺的恒久魅力恰恰体现于此。也只有通过对“诗性空间”的充分把握才能够充分领会文艺最本质的精神。正是文艺作品的“诗性空间”确保其能够突破时空、审美、文化的变迁而始终保持征服人类灵魂的力量。

另一方面,“诗性空间”虽然本质上依赖于创作主体的主动性创作活动,从根本上离不开创作活动这一实践本身,这一点理解起来是毫不费力的。然而,在创作活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诗性空间”并非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生成的状态,其同样随着创作活动渐渐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主动性,因为创作主体在通过创作活动试图抵达自身审美境界这一意图本身需要“诗性空间”为之提供必不可少的活动场域及栖息场所,以避免创作主体处于彻底的茫然无从的状态或者难以通向最终的审美境地。

事实上,若实际而细致地考察创作活动本身,“诗性空间”无疑体现出创作主体鲜明的个性化、情感化、真实性、审美性等特征。“诗性空间”本身就能够充分地表达出作者性情的灵活、情感变化的真切以及审美倾向和风格特征等,自身具有很鲜明的独立性。同样,如若再度客观冷静地审查“诗性空间”,其本身在体现出以上诸多特征的同时,也会呈现出普遍的、鲜明的“阴暗”的一面。这一“阴暗面”同样涉及创作主体的个性、情感和审美等,如缺陷的特征,场所的封闭、心灵的阴暗,行为的荒诞等。因此,“诗性空间”通过创作主体的塑造自动地呈现出一种“聚集”现象,正如前面对之进行的相对清晰的分类一样,呈现出辐射性的立体化特征,这也正是统称其为“诗性空间”的意图所在。

二、“诗性空间”的典型性分析

正如前面的分类一样,“诗性空间”在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通过对文艺作品的细致考察可以大致对

之进行相对合理的归类,在此基础上有对其进行具体分析阐述的必要。第一节所列举的贾雨村与丫鬟娇杏的偶遇以及芥川龙之介一系列短篇小说题材可以大致归为第一类的“诗性空间”,即单纯的动作、特征等。至于第二个分类:封闭而隐秘的空间、行为,同样可以普遍地在文艺作品中找到比较典型的例证。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作为单维度的动作、特征、持续的行为,还是多维度的空间,“诗意”都已不满足于平淡的表述方式而往往趋向于极端。这一涉及情感、审美的表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文艺自身的特征起到有力的辅证作用,即文艺在深度的表述上是阴暗的、隐秘的,而非简单的、轻松的。此种极端而消极的审美观在“诗性空间”中得到了最为精彩的体现,因此在属性上两者可谓是达到了本质上的高度统一。此种动因促使了此类情节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如在封闭而潮湿、阴暗而充满恶臭的厕所里,当周围的环境陷入死亡般的沉寂,人们都已陷入死亡般的睡眠,主人公却异常清醒地实施着自身设计周密的自杀计划。在这样的情节设计中,作为“诗性空间”的弱小主体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对比的双方有时尽管在性质上比较相似(如夜的漆黑与死亡的阴森恐怖),但其中必然包含某种极端而强烈的一面(在上面的情节中表现为主人公自身异常的清醒与客观世界的麻木、冷静),这种即相似又冲突的关系为“诗性空间”注入了浓郁的审美意味。但整体而言,在这种人物与环境对比的关系中,人物在自取毁灭的道路上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无助地位。

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审美感受,在情节的设计上则是具有主体性的人物拥有了绝望的主动而侵占性的权势和地位。此时的“诗性空间”虽然同样是隐秘而封闭的,却充满了暴力性的恣肆和狂欢。在人物的恣肆和狂欢面前,周围环境的设置则显得不堪一击。在情节上的一个典型体现是一对青年男女为发泄自身的爱欲躲在公共厕所(或者临时搭建的简易、狭小的密闭空间)怀着极为兴奋而警惕的情绪以怪异的、高难度的姿势在马桶上做爱。此种情形下主体与客体的对比结果并非总是以完满的结局收场,但人物却一度达到了自身所追求的生命体验的狂热。于此同时的讽刺是,在厕所的墙壁上或者封闭空间的隔壁或门缝里,有人在悄无声息既羡慕又胆怯地偷窥,厕所简易的墙壁一不小心轰然倒塌,“诗性空间”也同样随之土崩瓦解。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诗性空间”中人物与环境的对比关系以何种具体形式呈现,审美的效果与特征如何,但有一个大的前提是绝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样一种属性从根本上奠定、确立了“诗性空间”共同的基本的审美内涵,也是之所以称之为“诗性空间”的根本所在。具体而言,一方面,空间的密闭性为作为主体的人的原始情感的自我察觉、自我暴露、自我发泄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密闭空间所起的具体作用即是为主体营造了暂时的与世隔绝的假象,同时为自我蒙蔽的情感生成提供空间上的便利——置身于这样的密闭空间中,人物很容易在自我的激烈波动的情绪下产生冲动性的臆想症,并且在意识上不由自主地为之实施一切荒诞的“创举”。无疑,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是极具危险性的,但正是这种冒险行为与其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确保了人物极端性的“审美”;另外,仅就所谓的“空间”而言,不同空间虽然在共时态上能够确保隐秘性和封闭性,却无法消除历时态上的差异。因此,性质完全一致的“空间”对于人物而言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功能意义。如客厅与厕所的区别,两者相较而言,后者则更可能为人物的诗意行为提供空间上的可能性,而前者这种可能性就会小很多。究其原因,就在于前者受到历时态的深刻影响。虽然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无疑都是人流聚散的公共场所,但在自身属性上前者却是更为开放性的,对外界的人或事持有一贯的开放性姿态,在寥寥几张桌椅的空荡荡的客厅空间里却流动着形形色色、时间持久的活动迹象——迹象包括各种各样,如人的笑声、外表、行为遗留的痕迹等——正是这种潜在的迹象破坏了隐秘的安全性,当人物置身其中时,自身的主体性无形中会受到空间历时态遗留迹象的干扰而被剥夺掉。与之相反,厕所虽然同为鱼龙混杂的开放空间,但由于自身现实功能的暂时性和隐蔽性,于人物出出进进的同时阻隔、破坏了行为和迹象的历时态,尽管出入于此类空间的人物形形色色、各式各样,其自身的迹象却被一出一进的单调行为不知不觉予以割裂而销声匿迹。当人物处于这样两种性质迥异的空间里时,主体性表述的安全性和隐秘性难免会受到历时态遗留后果的影响,而产生程度不同甚至性质迥异的诗意体验。不过,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可以除外,那就是后现代背景下的先锋派文艺所追求的标新立异、程度夸张的审美效果,即赋予作品中的人物刻意而主观的“离经叛道”,对前一种空间历时态

的遗留物采取主动冒犯的狂妄行为。

三、“诗性空间”象征意义的蜕变

事实上,随着以工业技术为核心动力的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了超乎传统思维的本质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如影随形地发生在文艺领域。传统的所谓“诗性空间”也已无形中出现了大规模的“逆叛”。综合起来,主要表现为文艺生产者的审美心态的转变,当然,这一转变同样发生在普通大众慑于生产力作用下的思维变化。在变化方向上却如同安逸的平庸人性一样,文艺的审美同样丧失了以往精致而健康的状貌。即便如此,富有天赋秉性的文艺者们最终寻找到了符合实际状况的突破路径,在审美和诗意的表达上走向了极端。至此,“诗性空间”实现了自身功能的大幅度转移,具体的表现是:一方面,传统审美的神秘性开始逐步淡化,外在刻画的精致开始变得模糊,狭小而封闭的“空间”被动地失去了吸引力,反而被采取了更为大胆的鲁莽的处理手法,常见的场景被空洞而冷漠的荒凉现象所替代,世俗人性遭遇普遍性的边缘化而让位于生命体验的荒芜。一方面,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审美立场,甚至对基于第一方面的处理手法也予以了全然摒弃,投入到了彻底的世俗的琐碎之中,从宏大之中摇身一变为日常凡俗的迷醉——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即是私语性的以及现实主义的表述。以上两种具体的表现无疑成为当前文艺审美方向的两大趋势——在这一点上,不少先锋文学的刻意陌生化和疏离化都已经显得多少有些自作聪明了。结合文艺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一种表现某种程度上又与传统的审美存在藕断丝连的关系,在传统审美的范畴内做了更深入、更细微的探索和表现。与文中所提到的三个类别的“诗性空间”的区别在于,后者显得更为的深邃、抽象、平淡。这样的审美同样可以在传统相关的作品中找到典型例证。一种常见的文艺现象即是作品中貌似毫无寓意的审美情景的叙述。另外一些普遍的审美现象同样可以对此予以佐证,如中国古典文学中纯粹写景的诗词、日本的物哀文学等。在具体的描写中有关人物的言行举动、情感活动等基本予以整体排斥,呈现出来的却是客观的诸多物象,这一现象是与上面所谓的特征鲜明的“诗性空间”有着显著区别。“诗性空间”所体现出来的某种鲜明的象征、隐喻、对比等均被稀释和弱化,呈现出的却是极为平淡的审美场景,这种场景不再依靠某种传统审美惯性予以表现——甚至失去了对主观性表现的兴趣——而是仅仅在于一种无目的性的客观呈现而已。但不可否认的,就在这种无目的性的客观呈现中,无形中又能够凭借整体的描述赋予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区别和转别类似于后现代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反叛,它没有了主观性的主动表现欲,似乎其全部描述永远停留在肤浅的表面性的东西。然而,谁又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否定这种表现的方式呢?谁又能明确地认为这样的表现没有深刻的审美意义呢?文学因此而再度陷入复杂的纠纷和矛盾之中。如唐朝诗人王昌龄一首题为《初日》的纯粹写景的诗(这首诗在性质上几近于图片一样单一):初日净金闺,先照床前暖;斜光入罗幕,稍稍亲丝管;云发不能梳,杨花更吹满——这首诗仍未达到更加纯粹、彻底的地步,其中的“云发不能梳,杨花更吹满”一句无形中在客观景物中影射了人物特征的存在,凭借“云发”、“梳”这两个词在景物和人物之间隐约地建立某种联系,“诗里并没有直接描绘这金闺少女(除非云发二字暗示着),然而一切的美是这看不见的少女的。”^[5](P11)]这种“最后点题”的手法在传统诗词中普遍存在——随着表现功能发生变化,“诗性空间”的审美隐秘性渐渐发生转移,集中体现为对时空局限性的突破以及情景的“去智化”。作者们普遍表现出对人为寓意的审美疲倦,认为那些所谓的诗意从本质上是根本不靠谱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审美的局面,即作品创作的本身面目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自身审美的呈现,美感基本依靠客观的非人为的表象来维系,而且这些承载着审美意义的表象缺乏看似必要的深刻意义,更多地只是毫无意识的琐碎的客观呈现而已,它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一种意识性的东西,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纯粹客观的事实。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证明以上这种现象绝非不可能的。

需要重点阐释的是第二个方面(与第一个方面截然相反,甚至全然予以摒弃)审美的取向再次投入 to 繁琐的现实之中,并彻底沉迷于类似于世俗琐事的忧虑与迷茫的描述——通过描述对象的日常化、琐碎化倾向来取代传统的审美活动并以此以整体的形式呈现出新的美感。“文学对于日常生活持久的正面注视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向……文学的‘真实’必须纳入日常生活范畴。”^[6]

在这样的文学场域里,不止蕴含着审美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更多的是关于生命本体的种种思考的颠覆性变化在暗中起着作用。由于将生命过度的透视致使整个审美基调陷入彻底的悲观和绝望之中。因此,借助文艺实现对外部世界的表达本质上乃是一种无意识的连续性的记录过程,其记录的性质永远停留在外部世界所呈现出的最浅显的表层,试图借助表象——生命主体活动的真实迹象,达到对世界的完整理解和把握,甚至连这样一种类似功利性的动机都根本性缺乏。于是,不免会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人的内心在退化?或是整个世界在蜕变?这样的疑惑恰巧正发生在当下的世界当中。内心与世界的游离地带成为诸多学者探讨的广阔场域。

内心与世界的游离不仅意味着审美意识的变化,更根本的乃是对人之内心造成的极度压抑和吞并,在变化万千的外部世界面前,人性却困囿在日益狭小的抽象空间之内,并不停地督促着自我的压抑。尽管文艺者们试图以独特而尖锐的手段突破这种压抑,实现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交流,然而,换来的结果反而只是自我畸形的膨胀而已。“真正的先锋派文学交流的是交流的断绝。”^{[7](P56)}不仅如此,人与世界的脱离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越想象,其中一种日渐显著的危险现象乃是随着自我空间的封闭和挤压,人的内心的敏锐性却异常地发达起来,这种敏锐性在为人们提供更强大的幻想力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更多的负面性,这种负面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其中一个典型而普遍的现象乃是人的心理的多样化的变异。事实上,在同样的生存背景下,诗意的想象力同心理的病态是同等急速而怪异地发展着,种种体验危机也就随之而生。

四、体验危机的发生及征兆

事实上,危机与想象力几乎是同时并轨前行的,危机加深的同时想象力也在旺盛地蔓延,想象力作为虚无的载体承受着双重复杂的意义,即与现实的本质背离以及自我的无助与拯救。关于危机产生的最原始根源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颠覆着以往统治性的观念,理论家们开始对那些习以为常的真理性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但却仍旧受制于某些坚不可摧的意义因素,如生产力、意识形态等,很明显,质疑之声逐渐四起,然而无法对现状进行实质性的改良。甚至就连那些头充满智慧、目光高远的智者也难逃现实巨大的影响力,一边自我诚恳地呻吟、一边陷入现实的漩涡之中——在物质性的发达以及理性的无限蔓延中,人们无形中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合理而诗性的幻想蜕变为病态的想象力的无限疯长——现实与想象二者之间没有了必然的联系,人性根本的合理性的需求因此被阻断。尽管如此,呈现于表面的仍旧是绚丽多彩、眼花缭乱的某种并不靠谱的富足感和幸福感,并以各种各样复杂、诡秘的手段使之深入人心。

这样一种看似完好的局面却忽视了一种需冷静审视的涉关人性对客观现实的情感体验。面对发达的理性的无形压迫,人性的情感体验非但没有妥协、萎缩反而愈加疯狂地伸张开来,只不过是以前不同的隐秘而畸形的方式——即便这种病态的方式被人们隐约察觉,但在理性的指使下,人们往往在一种类似误区和错觉的场域中对此进行合理性的分析,继而对病态的诱因毫无察觉地进行转移,从而试图达到抑制的目的。事实表明,这一普遍的充满科学和理性的现象相反地成为其无形而强大的助推力,形成了恶性的无尽循环。我们可以尝试想象,当夜深人静之时,面对深邃的夜空和皎洁如银的月色,在夜色营造的错觉中,人们突然醒悟似地体验到某种清醒久违的单纯美妙的诗意,得以暂时摆脱白昼世俗力量的困囿,仿佛一瞬间清醒地意识到整个世界的真相并生机勃勃地生存其中时,内心体验与想象之间的关系是充斥着紧张抑或完美合一呢?我想这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严肃问题。随着危机的产生,想象力的无限蔓延程度的加深,随之而来的便是梦魇性质的内心封闭的压抑体验,这一体验甚至可以轻易达到癫狂而极致真实的程度。此时的心理体验已不只是特征上的征兆而成为了一种颠覆性的决定力量。

客观上,体验危机的生成不仅取决于诗性空间的营造,即其生成不止是偶然性的个人化的事件。就当下而言,随着社会物质性力量的强劲发展,体验之危机已经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且深入人心,并以整体的隐秘性的巨大作用力左右着人们,使之彻底困囿其中。这样的结果是,从文艺的审美角度而言,诗意的创作在其最本质的基础上受制于内心的危机而表现出病态而离奇的特征,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在

这一过程中,创作者们凭借自身顽强的意志试图使自己的作品尽最大程度地体现出一种新颖的特征来掩盖这种病态,这种隐藏的动机成为文艺现象纷繁复杂的根本原因。毋庸置疑,卡尔·马克思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仍旧发挥着巨大作用,社会的基础性的力量从源头处便无形中发挥了足够而持久的影响力,其中自然也包括部分自然的人性的原因。人类的情感体验仍然受制于物质、生理等根本性力量的绝对影响。如胎记、伤疤等生理缺陷往往在潜意识的支配下被具有相似属性的客观物象所代替或遮掩等,类似用具有个性的造型、优美的图集作为补丁,遮挡衣服的破洞,为了体验的安全性需求而选择带有明显灰暗色彩的文字、图像、物体等其他客观性物体。在外部庞大而深不可测的胁迫力面前,人们的臆想症会得到更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想象力和诗性空间形成强烈反差并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想象力愈是逼真,诗性空间愈是狭隘,在这种强烈对比力量的作用下,反而可以见出体验危机的真实面目。一个真实的事例和现象就是,人们会在阴暗而狭隘的空间内而产生更为逼真的病态而恐怖的幻想,如被偷窥、监听诸如此类的臆想症。由此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出诗性空间与审美体验的某种质的蜕变。

主体内部体验危机的发生与消解的需要,为主体提供了某种病态、虚幻、逼真的诗性空间,以此弥补现实生活体验的致命缺陷。真实被虚构所取代,虚构空间取代现实生活为情感体验以及艺术想象力的发生提供了场域保障,通过个体性的主观臆想企图达到体验的合理性。在这一过程中,审美体验对于生活化细节特征的需求遭遇到了空前危机,被病态的癫狂的臆想予以填充,从而制造出类似镜子影像的假象。本质上,这反而无形中进一步加剧了体验的危机。诗性空间与体验危机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同样为危机的化解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指导,即基于真相洞察、还原的由内而外的危机化解途径。

参考文献:

- [1]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3]鲍桑葵.美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4]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M].金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6]南帆.文学性、文化先锋与日常生活[J].当代作家评论,2010(2):6-7.
- [7]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陈丽]

Poetic Space and Experience Crisis

WU Qing-ke

Abstract: In some sense, the realization of expressive ability on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relies on the literary poetic space. The significance of poetic space to literary and art creation and aesthetic ideology research needs to be valued and cultivated. The enriched connotation of poetic space itself and it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extural features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 require detailed understanding and elaboration. With the change of aesthetic ideas, some common phenomena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time appear in th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the poetic space, showing a more obscure morbid transformation crisis, which is essentially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Key words: poetic space, experience crisis,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